



高 教 研 究

2022年第1期

发展规划处 编

目 录

【教育资讯】

-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1
- 教育部公布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新增和撤销本科专业名单.... 2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助力青年人才成长3

【高教视点】

- 推进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5
- “破五唯”后学术评价如何更好推动学术创新? 11
- 深刻理解“淡化身份、聚焦学科”这一重要变化 14

【高教动态】

- 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如何进档升级22
- 河南省推动高校参与企业研发活动28

【理论研究】

- 高等教育“深水区”与大学转型发展29
- 以先进的质量保障理念促进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 44

【建设实践】

- 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逐年提高背后.....58

◆ 教育资讯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月5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加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在职培训与待遇保障。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我国有2.9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教育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加大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建设力度，提高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3700多万学生受益。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超额完成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国家助学贷款每人每年最高额度增加 4000 元，惠及 500 多万在校生。

在部署 2022 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1000 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继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共建共享一批公共实训基地。使用 1000 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让三百六十行行行人才辈出。

（《中国教育报》2022 年 3 月 6 日 作者：高众）

教育部公布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新增和撤销本科专业名单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新增 1961 个专业点、撤销 804 个专业点，31 种新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教育部在本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中，支持高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设置符合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专业；引导高校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增设文理、理工、医工等交叉融合的新专业。

为确保专业设置质量，教育部要求，高校增设专业应满足《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基本要求。同时，加强了线

上评议环节，组织 4300 余名专家审读专业申报材料，对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高校根据评议意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师资配备，改进教学和实习实践条件等。

经申报、公示、审核等程序，教育部对各地各高校申请备案的专业予以备案，并根据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结果，确定了同意设置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

据了解，2012 年以来，教育部聚焦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支持全国高校增设了 1.7 万个本科专业点，撤销和停招了近 1 万个专业点，推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不断优化。

（摘自“教育部网站” 2022 年 2 月 24 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 助力青年人才成长

记者从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获悉，2018 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持续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加大人才项目部署力度，稳定支持青年人才成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由 200 项增加到 315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由 400 项增加到 630 项，取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非华裔外籍申请人的限制，设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人才资助体系稳步升级。

会上，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作工作报告。据他介绍，2018 年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持续推进以“三项改革任务”为核心，以“加强三个建设、完善六个机制、强化两个重点、优化七方面管理”为重要举措的系统性改革，各项任务取得重要进展。

在资助导向上，基于“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和评审覆盖 85% 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在评审机制上，稳步推进“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RCC）评审机制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 45 个学科。在优化学科布局上，按照“符合知识体系逻辑结构、促进知识与应用融通”的原则，全面实施新申请代码，申请代码体系由三级调整为两级，代码数量由 3542 个缩减至 1389 个。申请代码的科学性、包容性、引领性得到科技界广泛认可。基于板块的资助布局改革稳步推进，将 9 个科学部整合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命与医学、交叉融合四个板块。

在学科交叉研究资助管理改革上，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并首次启动交叉科学部资助业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交叉领域，建立健全面向交叉融合研究的人才、项目资助机制。此外，“放管服”也持续深化，全面实行无纸化申请，简化项目申请承诺报送，优化初审要点，深入实施代表作评价制度，率先开展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全面推动人才类项目实施“包干制”，下放项目经费使用调剂审批权。

（《光明日报》2022 年 3 月 25 日 作者：杨舒）

◆ 高教视点

推进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月5日，李克强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两会期间，围绕“推进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这一重要问题，本报记者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进行了专访。

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记者：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您怎样看待中西部高等教育在实现教育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问题？

杜玉波：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版图上，中西部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半数之多，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是中西部全面振兴的战略内生力量，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稳定、民族团结和多元文化融合

等重大战略和核心利益。可以说，没有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教育乃至国家的现代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促进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没有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就无法全面缩小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十三五”期间中西部高等教育取得长足发展但仍有短板和不足

记者：近年来，党和国家相继颁布出台了一系列战略举措，总体指导和有效支持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您认为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未来发展中存在的短板有哪些？

杜玉波：成绩主要体现在，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改善了办学条件，提升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十三五”期间，中部地区普通高校增加 49 所，西部地区新增 92 所。以部省合建的新机制新模式，重点支持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 13 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4 所高校建设。启动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累计支持 173 所高校教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00 余项，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07 亿元。

但是客观地讲，与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相比，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与“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目标相比，中西部高等教育仍存在明显差距，集中反映在以下方面。

从办学经费投入看，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事业费支出为 2.1 万元，其中东部地区 2.3 万元，中部地区 1.6 万元，西部地区 1.7 万元。中西部地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差距仍然较大。从高水平大学分布来看，教育部公布的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东部地区较上一轮新增 5 所，共入选 92 所，省均 8.4 所，占总数的 62.59%；中部地区新增 5 所，西部地区无新增，中西部高校总共入选 55 所，省均 2.8 所。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明显。从教师队伍建设来看，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以上占比 65.17%，其中东部地区为 69.98%，中部地区为 60.31%，西部地区为 61.6%。中西部与东部仍有一定差距。从科技创新能力看，2020 年在校均专利出售金额方面，东部地区高校是中西部地区的约 3 倍；在校均技术转让实际收入方面，东部地区高校是中西部地区的约 4 倍。从受教育程度看，“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国为 9.91 年，低于 9 年的省份均在西部地区；全国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为 15467 人，低于 1.2 万人的省份均在中西部地区。这些指标只是揭示了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显性差距，更深层次的差距和短板往往是在理念、机制、环境上的，需要我们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主动作为、奋力突破。

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的主要发力点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效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您对如何建设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

高等教育体系有什么建议？

杜玉波：建设新时代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重中之重，需要我们坚持战略思维，强化系统意识，调动多方资源、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其中，我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要从以下3个方面发力：

第一，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把党和国家的支持政策转化为强大的发展动力。既要以“国之大者”的胸怀，谋深谋远谋实，把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又要解放思想，提升站位，从紧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小圈子”，提升到服务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发展的“大格局”上来。

具体来讲，一要从国家层面积极调整优化区域高等教育战略布局、加快完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机制，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深入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完善教育部、地方政府、合建高校、对口合作高校四方联动的部省合建机制，发挥部省合建高校集聚辐射带动作用，引领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二要集中力量加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在政策引导、资源投入上打破常规，特事特办，支持西部高校引进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以强有力的举措将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三要推动高校集群发展，发挥高水平大学的龙头作用和区域高校集群的溢出效应，带动引领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四要建实专业集群，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引导中西部高校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

总的来说，在政策层面还需要更大力度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同样的项目或平台，给高等教育资源“富裕区”是“春风送暖、锦上添花”，而给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区”则是“早逢甘露、雪中送炭”，甚至还能够起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重要作用。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注意，中西部高校要立足自力更生为主，不能再有“等靠要”的思想；要因地制宜，创新适合中西部的发展模式，不能简单模仿他人走过的老路；集群发展要“攥紧拳头砸下去”，真正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不能搞扩张、铺摊子。

第二，要精准施策、输造结合，探索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特色发展之路。推进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要在“精准”上对接需求，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使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服从于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需求”，既要火眼金睛发现真问题，又要精准靶向展现新作为。

近两年来，国家出台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系列文件，中西部高等教育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一是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在政策引导、资源投入上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强化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政策供给、制度供给，加大优质资源倾斜力度，精准扶持，不能搞大水漫灌。二是要输造结合，不断增强中西部高校自主发展能力，培育中西部高等教育造血基因，探索特色发展模式。三是要敢闯敢创，破除“西部意识”，不能因环境条件而束手束脚、规避改革。四是要聚焦区域发展急需，推动中西部地区高校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加强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和鼓励高校深度参与乡村振兴。

总之，我们要将高等教育振兴成效转化为区域经济的支撑能力，走出一条立足地方、扎根地方、服务地方，具有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第三，要多方协同、凝聚合力，全面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不是高校的“独奏曲”，也不是中西部地区的“独角戏”，而是以政府为主导，东中西高等教育联动发展，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交响乐”。

扎实推进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需要我们进一步贯彻落实任务分工，凝聚发展合力。一是要适度打破省域界限，主动对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西北、西南、中部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共建共享优质教育、科研、人才资源。二是要加大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强化经费投入，抓住教育新基建契机，政、产、学、研多方发力，构建多方协同的高等教育新生态，激发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动能。三是要深入推进对口支援和资源共建共享，建立东中西部高校全国性对口支援对接平台，精准实施对口支援。四是要坚持西部高等教育向西看的战略布局，将地缘政治优势扩展到教育开放的多元格局中。支持中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等加大教育合作交流力度，发挥区位优势，打造属于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模式和教育开放新格局。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西部高等教育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在中西部地区各级

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支持、高校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中西部高等教育一定能够突破“振而不兴”的困境，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教育报》2022年3月7日 作者：刘琴 高众）

“破五唯”后学术评价如何更好推动学术创新？

“学术评价体系建设和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建设等共同构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就目前来看，学术评价体系建设成为我国学术发展的瓶颈之一。”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发布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研究员指出，怎么有效突破，形成与新时代中国学术繁荣进步所需要的和相匹配的学术评价体系，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在这场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承办的论坛上，来自不同机构的学者，阐述了他们对于“破五唯”后学术评价的困惑与思考。

学术评价必须要多元、分类

“科学合理及时地识别创新，推广创新是学术评价的根本使命。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对推动学术创新有坚定的使命感、有效的针对性、良好的引导力和一定的包容度。”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杨红艳编审指出，学术评价推动学术创新，是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共同需求。

杨红艳介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选文、评文时，把推动学术创新

作为学术评价的根本使命。评价对象“不问出身”，只看论文创新程度和质量；在评价主体的选择上，则坚持同行对论文内容价值的分类直接判断。

对其他机构来说，要如何做学术评价？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长方卿教授直言，“破五唯”之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存在三大痛点：项目与成果评审之痛、机构评估之痛与人才评价之痛。在这些评价中全部存在新标准缺失的问题。“有时候，‘自家和尚念不了自家的经’，我们也希望第三方机构能够有所作为。”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韩召颖教授指出，“破五唯”后立什么，是困扰大家的共同问题。不过，如果想再找出一个唯一的、公认的标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指出，必须采用多元化、多层次的评价方法。

文科学术评价带有鲜明的目的性和价值性，而且人文学科成果多以著作呈现，代表作评价成为新时代文科评价的基本原则之一。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姜春林教授做过关于代表作评价的研究。他感慨，学术评价是一项高度复杂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何评价方法和体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在不同的评价场景下，评价指标体系也会有所差异。评价方法要为评价目的服务，效果也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他期待，我国能建设专业的书评数据库，构建学术评价研究共同体，并更多利用技术的力量，比如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著作全文本挖掘技术应用。

学术评价手段不能一味复杂化

浙江工商大学学术评价与科技统计研究院院长俞立平教授则认为，代表作评价也存在适用范围的问题。

比如，它缺乏规模评价的视角，无法进行跨学科比较；同一学科不同研究类型的学者代表作难以比较，学科异质性影响代表作评价效果等等。而在同行评议的层面，评审专家也有学识局限。

俞立平大胆指出，不宜随意扩大代表作评价的适用范围，尤其在宏观评价如学科评价中不建议采用代表作评价。分类评价进一步细化是代表作评价应用的前提条件，要建立量化考核与代表作制度兼顾的评审制度，提高代表作同行评审的规范性和质量，给高校一定自主权，并建议推广一些新的文献计量指标。

另外，论文数量、论文引用影响因子等指标宏观评价中应继续发挥作用。“评价技术、评价方法和评价手段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一味复杂化。”俞立平说。

“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可能还是客观评价的部分。但如果简单回到以主观评价为主的维度去恐怕也不行。”王玉梅建议，关键之处可能还在于改进和完善我们现有的各种客观评价方式，比如说把各种学术期刊办得更好，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审稿、用稿程序和高质量稿件的遴选机制，加大对包括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在内的各类二次文献传播平台客观评价数据的利用等。

“学术评价并不是对科研成果考核等级的一个简单评定，它是学术研究共同体的一种总体性精神文化氛围和共同协作的工作机制。”

王玉梅强调。

（《科技日报》2022 年 3 月 31 日 作者：张盖伦）

深刻理解“淡化身份、聚焦学科”这一重要变化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自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则明确提出“逐步淡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身份色彩”。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建设高校有关负责人，关注各建设高校对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新理念的认识，以及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新进展、新动向。

重在建设

有所为有所不为

■ 嘉宾：

东华大学校长 俞建勇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 李召虎

福州大学副校长 杨黄浩

本报记者：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对此，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您如何看待这一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对学校“双一流”建设有着怎样的启示？

俞建勇：“双一流”建设旨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

竞争力，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提升办学水平，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淡化身份、聚焦学科”的变化，其实就是对上述建设初衷的坚守与回应。“双一流”建设从来不是为了给部分高校和学科发帽子、定身份；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的高校和学科只是具有较好建设发展基础，具有冲击世界一流的巨大潜力，承载着国家的信任和重托；而最终能否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头角、赢得声誉，还要看建设具体成效。学科是大学实现其功能的核心载体，学科实力增强，大学水平方能提升。面对“双一流”建设的新变化，高校应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把工作注意力切实集中到“学科建设”这个内涵式发展的根本任务上来。

李召虎：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一流大学建设最终将落脚于一流学科建设。不突出强调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符合一流大学的建设规律，有利于打破高校身份固化弊端，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差异发展、内涵发展，不再把层次升级作为目标追求，不搞盲目扩张，把精力和重心聚焦到国家重大需求、关键领域创新与实质性突破上，做强做精做尖。

杨黄浩：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思路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不再强调“大而全”。办出特色、办出若干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知名学科，应当成为地方高校发展的指导思想。在未来建设中，地方高校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为中心，凝练特色方向，在融入学科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而实现异军突起。

本报记者：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您所在学校的学科建设遵循怎样的发展思路，将在哪些方面发力？

俞建勇：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东华大学将以高水平学科建设统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方向领域上，重点建设纺织、材料和设计等优势特色学科，打造学科高峰；大力建设机械、控制、环境、化学、管理、土木等具有较好基础和发展潜力且符合国家重点发展导向的学科，培育学科高原；积极发展软件、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战略发展理科和人文学科，夯实学科基础；打破传统学科间的壁垒，加强多领域学科交叉融合，有效促进更多学科快速发展，形成多峰并举、高原崛起、各学科互为支撑的学科体系。到“十四五”末期，我们希望学校高水平学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学科实力明显增强，高水平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升，产出一批标志性成果，成为世界纺织服装领域教育科研的中心，材料、设计等领域教育科研的重镇，早日实现“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奋斗目标。

李召虎：华中农业大学将按照“建高峰、强优势、促交叉、固基础”的思路，建设农业科学与生命科学特色鲜明，农学、理学、工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布局合理、融合共生、支撑发展的学科生态体系。具体来说，一是强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以及湖北省“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下重点打造的“十大农业重点产业链”，重点围绕生物种业、智慧农业等领域开展基础理论创新、技术研发应用，构建原始理论创新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格局。二是发挥一流学科辐射带动作用，

围绕智慧农业技术与装备等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布局若干优势特色学科群，建设一流创新高地。三是以“高精尖新缺”为导向，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积极发展生物医学与健康、信息技术与智慧农业等新兴交叉学科，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同时不断提升基础学科支撑学校人才培养和融合创新的能力。

杨黄浩：福州大学将立足特色，构建一流学科引领发展的新生态，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在既有化学学科世界一流学科群的基础上，继续特别扶持、不断做尖做强、持续提高学校化学学科群的学科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争取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果和社会影响。二是发掘潜力学科，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打通学科界限，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与智能管理、智能建造三大重点培育学科群，并给予重点扶持。三是通过世界一流学科的支撑引领，重点培育学科的辐射带动，建立良好的学科生态发展体系，做尖、做强一“点”，做优、做活一“线”，促进学校整体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立足特色

把学科建强建好

■ 嘉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单忠德

厦门大学副校长 周大旺

西北大学校长 郭立宏

本报记者：对比首轮“双一流”建设情况，您所在的高校新

增了建设学科。可否请您谈一谈首轮“双一流”建设以来，学校在学科建设上遵循了怎样的思路？

单忠德：首轮“双一流”建设以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围绕建设航空、航天、民航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加快建设、特色建设、高质量建设。学校坚持“特色引领、交叉融合、对标国际、团队攀峰”的建设原则，建立健全“整体规划一级学科、统筹协调经费支持、逐一审批学科方向、大力支持交叉融合”的建设机制，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坚持以“航空航天科学与工程”学科群为牵引，强化“三航”特色办学，以“做优航空、做强航天、做大民航”为目标，分类实施学科高峰打造计划、学科高原拓展计划、学科固本强基计划、学科国防特色计划和学科国际竞争力提升计划，促进工科交叉、理工交叉、文理交叉等多学科门类融合发展，“航空航天科学与工程”学科群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优势学科地位不断强化，牵引带动全校学科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周大旺：首轮“双一流”建设，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思路是“提升内涵、彰显特色、交叉融合、建设一流”。一是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服务目标更加聚焦。二是推进内涵建设、特色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实施学科优化提升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深化建设基础学科，大力发展工程和应用学科，创新医科建设模式，加快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学校立足“三海”特色，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发挥在两岸融合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建成“海洋碳汇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计量

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两个基础科学中心，加强集成电路产教融合等各类创新平台建设，与福建省九市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四是创新学科发展模式，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构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学科链发展模式，形成以重大科研项目为纽带的交叉学科队伍建设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创新引领能力，不断推动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和新商科建设。

郭立宏：“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西北大学按照“精基础、强应用、育交叉、促转化”的建设思路，一是打造一流学科“特区”，通过政策优先保障、机制优先突破、经费优先投入，全力支持地质学冲击世界一流，重点培育考古学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二是强化学科内涵建设，实施学科分层次建设计划，构建“方向—团队—平台—集群”递进式一体化学科发展体系。三是以绩效评价为杠杆，建立“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绩效考核—动态调整”全方位运行保障和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目标管理，突出投入产出比与建设实效。四是深化“一院一策”改革，充分给予院（系）人财物自主权，建立“双一流”建设协同发力机制，探索实施学科建设目标责任制，打造学科建设共同体。五是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地质学、考古学为引领，发挥学科交叉和集群优势，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秦岭生态保护等国家重大需求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面对国家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整体要求，今后学校将在哪些方面着重发力？

单忠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标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整体要

求，更加突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导向。坚持特色发展，打造一流学科体系；深化改革发展，打造一流学科水平；完善体制机制，打造一流学科生态。全面提升高水平人才培养能力，全面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全面提高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培养一流人才方阵、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服务支撑国家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南航智慧、南航力量。

周大旺：在一流大学建设方面，厦门大学的着力点包括：一是围绕立德树人使命，提高创新人才供给能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拔尖创新人才。二是深化“名师引育”，实施精准引才计划，培养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厚植创新发展核心优势。三是加强面向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自主创新，打造原始创新重要策源地。四是服务国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加强服务战略需求精准度。五是深耕核心价值引领，提升文化传承创新贡献度，立足“三海”特色，更高层次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六是多维“协同万方”，增强全球参与度与影响力。七是助力福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发挥对台优势，服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学科建设总体目标坚持“筑峰扬优、交叉创新”，重点建设包含新增的教育学在内的 6 个一流建设学科，以及中国特色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共五大优势特色领域，大力推动基础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前瞻布局若干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领域方向，构建梯次建设、分类发展、协调共生的学科体系，着力提升创新人才供给和创新成果

转化对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度。推动学科“入主流、创特色、上水平”，深入推进基础学科建设，推动新文科建设，大力发展新工科，着力打造新医科。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以一流建设学科为核心，构建“学科建设共同体”，带动和辐射一批学科快速高质量发展。

郭立宏：新一轮建设周期，西北大学将坚持“扶优、扶强、扶特、扶需”，着力构建“一流引领、基础支撑、交叉融合、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扶优——狠抓一流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特区”政策和保障机制，全力支持地质学、考古学打造学科高峰。扶强——重点打造一流梯队。支持有条件、有基础的学科积极培育“国家级平台、科研奖励和重大项目”等标志性成果，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形成冲击世界一流的学科梯队。扶特——加强基础学科建设。通过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与激励保障机制，以点带面实现基础学科的协调发展。扶需——服务国家战略急需。结合区位特色和学科优势，学校统筹谋划了“大秦岭发展行动”等专项工程，以期在解决中国问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西大力量。

（《中国教育报》2022年3月28日 作者：徐倩 张滢）

◆ 高教动态

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如何进档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文科建设协同 创新的经验

推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不仅是培养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以学科建设推动解决国家重大发展命题的关键举措。

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与配套支持政策体系的逐步构建，我国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等学科建设主体对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建设进行了广泛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理论研究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当前，关于如何推动学科交叉的自由生长与国家重大需求深度耦合，处理好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好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的“进档”，理性地推动学科建设和管理体系改革，从国际到国内都没有现成的模板可循，亟待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等学科建设主体深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在前期实践经验与优势学科基础上组建交叉科学研究院，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学科孵化建设，培养新时代人文理工交叉融合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人文理工交叉 融合的“人大模式”

2017年以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与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等概念的明确提出，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学科建设配套支持政策体系开始逐步构建。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与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变革的最新成果和关键课题，新文科建设与学科交叉融合、交叉学科建设紧密相关，相辅相成。中国人民大学在进行“十四五”规划编制及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方案论证过程中，深刻把握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深入总结“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建设经验，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人大特色”的新文科建设之路。

我们认为，“新文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面向新时代、新技术、全球化大背景，突破传统文科思维框架，以技术融合、学科交叉、理论创新为主要途径，通过专业课程、教材和平台建设，推动传统文科迭代升级，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集学科建设哲学、人才培养模式、学术发展规律为一体的综合性概念。

学科交叉融合是推进新文科建设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复合型高质量人才的必然选择。而新文科建设也为学科交叉融合与交叉学科建设提供了具体命题和重要实践机遇。

然而，不论是学科交叉融合还是新文科建设，都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高等教育的资源统筹性、学科协调性、人才培养精密性都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要求。我们立足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文科建设协同创新、深度耦合的引领性实验及经验，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基础优势，

统筹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以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为牵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走出一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导的人文理工交叉融合发展之路，以期为我国学科创新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贡献“人大智慧”。

学科交叉融合助力新文科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立足“独树一帜”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优势，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努力在新文科建设中作出示范性贡献。

一是在学校层面打造“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体系。

学校以“大平台、大团队、大交叉、大协作、大项目”为建设思路，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国家安全、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区块链、人工智能、应急管理、公共健康与卫生疾控、未来法治、乡村振兴、智能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搭建了有层次、有梯度的“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体系，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规范化管理体系。通过建设任务书立项审核引导平台主动谋划，加强协同教学、协同研究、协同创新，建立并完善一对一联络、定期沙龙、联合人才培养和品牌建设等新机制。新增博士招生名额对平台定点投放，探索问题导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二是在学科层面建设“大团队”、开展“大交叉”、聚力“大成果”。

学校的优势学科在学科交叉领域主动引领，形成了民法典、宏观经济、科技金融、区块链、乡村振兴等多个跨学科大型人才团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学校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下，设立“马克思主义+”学科交叉平台，加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各学科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融合创新、协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相关学科统筹发展、一体建设。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传统优势学科内生活力与整体动能进一步释放，新的学科增长点与生长方向进一步拓展，高质量、原创性成果层出不穷。

三是探索教学与科研互融互促的新型文理交叉。学校成立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区块链研究院，探索建立新型交叉研究中心，打造“数字+社会科学”学科交叉生态体系；成立数字政府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数字清史实验室、数据法学实验室、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大数据实验室、国际传播大数据智能实验室等一批新文科主题实验室，促进技术赋能学科交叉融合；成立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构建新时代舆论生态研究、评价与决策支持的引领性平台；搭建多层次数据智能平台，促进优势人文社会学科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深度融合，支撑传统学科转型和新文科建设。

四是构筑学科交叉政产学研共建共享新形态。创设“政府—学界—业界”深度融合的政产学研新机构、新机制。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合作，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与国家统计局密切协作，建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双碳研究院、国有经济研究院；集成攻关智能化社会治理，助力北京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深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拓展校企合作与社会服务，拓展产业合作资源，形成了政产学研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协同发力的良好局面。

以交叉科学研究院为核心引领学科融合发展

作为全面推进改革创新的“学科特区”和“人才培养特区”，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旨在更加精准聚焦党和国家现实急需、发展急需、未来急需，以国家“急难愁盼”和重大战略问题为牵引，坚持“一定是学校层面、一定跨一级学科、一定聚焦文理交叉”的建设思路，发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激发学科建设内生活力与整体动能，开辟新的学科增长点与生长方向，不断强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创新、思想引领”价值功能。未来，交叉科学研究院将努力探索一条具有人大品质、人大特色、人大使命并引领时代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之路，从而为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文化自立自新自强自觉奉献人大力量。

打造机制创新试验田。第一，立足客观发展规律，探索建立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交叉型师资队伍。交叉科学研究院探索实行跨学院、跨学科团队PI负责制，推行校内首席专家双聘制试点，并在首席专家与新引进专家学者中探索施行长聘制管理机制。第二，坚持互惠共享理念，探索建立跨学院合作成果认定与奖励制度。交叉科学研究院实行以合作解决重大问题为重点的整体性评价，按照创新性、贡献度、影响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大胆探索、挑战未知。第三，把握时代发展机遇，探索形成面向未来的学术治理与评价体系。推动成立交叉学科领导委员会，探索成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叉学科分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交叉学部以及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管理委员会等，进一步完善符合交叉

学科发展需要的学位授予机制、科研评价制度、教师评聘制度和人才培养方案，着力实现学科深度交叉与实质性融合。

形成人才培养新高地。交叉科学研究院明确“家国情怀、人文素养”的培养目标，教育引导學生争做“复兴表率、强国先锋”，把个人的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深入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全面促进新技术背景下的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人才培养，进一步打破学科、学制、地域壁垒，打造以数据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为底层架构的“数字社会科学”集群，按“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人文”三大板块开展交叉型博士研究生培养试点工作，单独配置博士生招生名额，组成班级集中在交叉科学研究院开展学习、科研、实践。

建设师资团队示范区。交叉科学研究院探索设立重大议题揭榜挂帅攻关平台，以之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育与创新团队建设破题之举。紧紧围绕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区块链）、国家治理、乡村振兴、中国经济学等重点领域，遵循“问题导向、项目牵引、平台支撑、团队协作”建设思路，面向国内外招募战略科学家和首席专家，打造若干个研究水平高、发展潜力大、战略聚焦性强的优秀跨学科团队，为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文科建设积蓄深厚的学术团队和研究生导师基础。（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报》2022年3月14日 作者：刘伟）

河南省推动高校参与企业研发活动

河南省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印发《推动高校参与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实施方案》，到今年底，“双一流”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创建高校、本科院校、高职高专与企业联合实施 1000 项左右技术合作开发项目，共建 1000 家左右各类研发机构（平台），实现高校参与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

河南将搭建全省高校参与规上企业研发供需信息平台，建立高校参与企业研发活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高校技术成果和企业研发需求信息入库工作，实现科技人员与市场、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即时双向对接，“订单式”研发。各高校要立足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与企业加强合作，按照“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要求积极与相关企业开展对接活动，实现工、农、医类专业共建研发中心全覆盖。

高校应将教师参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效纳入绩效考评、职称评审、年度考评范围，分档给予相应激励支持。高校教师应主动将在校生成纳入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团队，并将学生参与企业研发项目情况纳入学业成绩认定范围，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应在评优评先、奖助学金发放、研究生推免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2 年 3 月 26 日）

◆ 理论研究

高等教育“深水区”与大学转型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其历史进程中都会遇到发展的“瓶颈”期。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深水区”，而大学转型发展也是我国近年来探讨的热门话题。“深水区”的比喻，是对高等教育前行之路充满挑战的判断，其中既有对改革艰难的担忧，也饱含着对改革的期待：闯过了“深水区”，可能就天堑变通途。而转型发展则是对原有高等教育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及大学模式提出的时代要求。其实，无论是“深水区”还是“转型发展”的提出，都要求高等教育正视发展的环境和挑战，解决如何适应现实和未来的需求。高等教育“深水区”和大学转型发展，给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留下了更深更广的思考空间：是继续“负重”前行还是“轻装上阵”，是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行还是另辟蹊径？面对难以绕过的“深水区”，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解读我国高等教育的“深水区”现象？哪些现象属于“深水区”问题？需要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思想准备和技术路线蹚过“深水区”，是闯过“深水区”还是绕过“深水区”？这些问题是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之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

一、正视高等教育的“深水区”现象

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面临着“深水区”，始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决定》中党中央明确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新

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我们国家对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未来经济发展做出的战略性判断，更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发展方向。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将探索与试错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找寻发展规律。随着世界竞争格局日趋激烈和我国各项改革逐步深入，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去寻找符合“新时代”“新要求”“新目标”的路径已然不够，需要迎着困难与艰辛创造新的发展模式。正如《决定》中对“深水区”改革决心和难度的表述：“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存在着“深水区”，这也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党中央对突破“深水区”提出的要求和所下的决心，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该要求释放了“深水区”改革之艰难，使命之重大。

“深水区”是我国在新时代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深水区”并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延续和深化过去的认识，如“高等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就直接揭示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还有一些必须解决但仍未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深水区问题具有复杂性、错综性、长期性的特征，体现着深层次、系统性、覆盖面广、牵涉利益主体多，且一时难于解决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沉痾已久的“五

唯”、呼吁多年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几十年未变的人才培养模式、惰性十足的专业教育模式、学科与专业之间的森严壁垒、与市场脱节的学科与专业结构等，都属于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深水区”问题。诚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深化过程。实际上，高等教育的“深水区”是历史问题、现实问题以及未来挑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过程，可以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进行解读。从历史维度看，“深水区”是历史遗留下来想解决而难以解决或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如政府集中管理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矛盾，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等；从现实维度看，“深水区”是国家关心、社会关注、百姓关心的若干实际问题，如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等；从未来维度看，“深水区”是高等教育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产生的新挑战，如人工智能和教育技术有可能“颠覆”未来的学校模式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把改革作为发展的主旋律，高等教育大致经过了恢复秩序、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等几个阶段，迎来了相对稳定的40年发展时间。那些位于“浅”层次且容易解决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可“深”层次且不容易解决的“硬骨头”依然存在。面对新时代的到来，改革历史遗留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解决的成本越来越高，并逐步呈现为更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关系的对立。如最为突出的就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时至今日，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哪些问题可以用市场手段解决，哪些问题可以用计划手段解决，一直并不清楚，以致于该用计划手段

解决的问题用了市场手段，该用市场手段解决的问题用了计划手段；该由政府解决的问题交给了高校，该由高校解决的问题推给了政府。此类现象的存在，都在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厘清，或者说适应新时代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并没有突破”。再如教学改革，国家不可谓不重视，仅仅在国家层面就进行了8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数量为几千项，再加上省级政府评出的教学成果奖，数量有万余项。这些教学改革虽然初见成效，但优秀教学成果奖的示范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数据回答有多少高校在同步进行改革，其效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理想状态。我国今日科技创新不够和面临的一系列“卡脖子”问题，其关键就是人才培养能力欠缺，从而加重了社会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的“质疑”。进入新时代，伴随“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高等教育所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越来越多，解决难度也随之增大。因此，在“深水区”困境之下，我国高等教育急需寻找一条能够闯过“深水区”的路径。

高等教育的“深水区”是一种预警功能，它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界的危机意识和应对危机的觉醒。严格说来，今天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并非都是“深水区”问题，有些问题从局部来看是“深水区”，从整体看并不是“深水区”；有些问题从眼前来看是“深水区”，从长远看并不是“深水区”；有些问题从学校内部来看是“深水区”，从外部看并不是“深水区”；有些问题从个别学校来看是“深水区”，对其他学校而言并不是“深水区”……说到底，高等教育的“深水区”问

题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所谓的“深水区”，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深。相当一部分看似“深水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深水区”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治理问题、习惯问题、常识问题和文化问题。把“深水区”问题当成“浅水区”现象或当成“神经末梢”的问题，解决的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质问题。如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个问题恰恰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解决高等教育的“深水区”问题，只能立足于国情。在过去的改革实践中，我国高等教育通常是借鉴西方已有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难点与问题，但今天我们面临的“深水区”问题，已经很难到西方国家找答案和参照系，西方高等教育的部分经验显然在我国出现了“撞墙”现象。以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实现普及化为例，西方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解释力逐渐减弱，我国走过的路几乎无法在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得到验证。这也就是说，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只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没有指标上的价值。但恰恰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时，指标成了主要选择。殊不知，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发展进程都是前无古人的实践，长期的“跨越式”和超常规发展带来的问题，其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判断，我们遇到的问题与西方国家有天壤之别，如高考的公平问题、高等教育的区域公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等。

人们之所以把当下高等教育发展遇到的困难比喻为“深水区”，主要还是改革动力不足以及以往形成的惯性。“动力”涉及的是态度，“惯性”涉及的是文化。上述“深水区”问题的长期存在，其实是认

知之浅以及缺乏“闯关”精神的表现。人们面对“深水区”，大致有几种态度：绕着走、不走了、往回走，勇于“向前走”的较少。如果照此下去，“浅水区”也成了“深水区”，“深水区”也就永远过不去！

二、高等教育的“深水区”在哪里

到底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有哪些“深水区”现象，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深水区”理解和判断的不一致，是当前闯过“深水区”的最大障碍。把我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的发展比喻为“深水区”，说明“深水区”并不是一个“孤立”或“局部”的问题，而是表现在高等教育的宏观、中观、微观等诸多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一直纠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放管服”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从中观层面来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大学治理体系以及制定大学章程等提倡了多年，表面上高校似乎在朝着这一方面改进，但实质上大学的治理模式并没有发生真正改变。从微观层面来看，以课程和教学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相关问题仍然常年处于“深水区”，知识体系、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等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以及年轻一代的学习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宏观、中观、微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下放高校自主权的程度影响着大学治理模式的变革，而现代的人才培养体系归根到底是以现代的大学制度为基础的。因此，一个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将连带着其他问题也陷入泥淖无法自拔。目前对“深水区”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其一是把“深水区”的问题看成“浅水区”，其二是把“浅水区”的问题看成“深水区”。尤其是当把“深水区”的问题看成“浅水区”的时候，

高等教育改革只能停留在“浅水区”层面。当然，这不是说“深水区”问题无法解决，恰恰相反，若能找准“深水区”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说，认识“深水区”问题、识别“深水区”问题，就成为解决“深水区”问题的关键一步。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我们认为“深水区”主要存在于以下4个方面。

（一）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深水区”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涵盖面广的“深水区”。因为高质量发展涉及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高等教育若真能做到高质量发展，那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大部分问题都将得到解决。从这种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所涵盖内容的丰富性，正是它作为“深水区”问题的表现。因此，要想解决这一“深水区”问题，就需要在方方面面的高质量发展中找到核心和关键所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发展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高等教育已然获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如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速度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在校生规模世界第一、出国留学规模世界第一、大学生毕业率世界第一等；二是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活跃在各大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列，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大学的社会声望都在显著提升，但这些是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注重教育内涵发

展”，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至于今天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这些发展目标既体现了国家的教育质量意志，也反映了社会对教育质量期待的不断升级，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当高等教育仍不能满足国家对优秀人才的迫切需求，当我国仍无法在“卡脖子”技术等关键领域建立起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当精英人才的培养渐渐消弭于普及化的浪潮之中时，我们对各类人才的渴求，已经使高等教育改革总体进入更深入与更艰难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的“深水区”是相对于我们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站在更高的格局、更远的目标来看待，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要紧紧抓住立德树人这一主线，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立足点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这一核心。

（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一个“深水区”

与高质量发展不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深水区”，一直在改，但一直收效甚微。原因之一就是人才培养的许多活动都是大学微观层面的事情，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解读为“深水区”，显然是一个认可度不高的命题。本来从大学的三项职能上看，人才培养是大学获得合法性的首要和基本职能，是它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根本特征，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摆在大学发展的首位。但是，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大学的这一首要职能总是被弱化甚至被忽视，致使一个本应充满活力、不断改进的领域变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就一直在进行改

革。先是 20 世纪 50 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然后是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苏联模式向美国模式靠拢。如 2003 年，国内开始有高校启动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效仿这一模式。应该说，大类培养模式是我国高校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有益探索，但遗憾的是，今天的大类培养已经开始出现倒退的趋势，一些高校几乎又回到原来专业培养的老路上去了。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实际上折射着人才培养中的诸多问题，如课程体系与结构陈旧、不合理，课程内容重复、与实际脱节，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基础课程衔接不够，学生无法实现“率性而学”等。这些年我国政府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力度上不可谓不大，自主招生、强基计划、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拔尖计划、卓越计划等，都是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契机，但是应该说目前的改革和社会各界对其所给予的期望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

究其原因，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该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科技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年轻一代获取信息的方式，而我们的课堂还是传统讲授式甚至是灌输式课堂，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能够跟上时代发展变化的脚步？当知识生产变得更加多元和开放，企业已经开始成为科技研发的主力，而我们的教学还在重复陈旧过时的知识，而我们需要追问：人才培养模式如何能够满足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因此，对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种老生常谈的“深水区”，应坚持与时俱进，开放办学，转变观念，不断改进。

（三）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个“深水区”

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深水区”，它处于“深水区”的“最深处”。大学治理是大学为了实现办学定位、发展规划、教育理念、教育目标等任务施行的各类治理结构、治理规则、治理实践的总和，包括责任主体的分配、相关利益的维护、上级决策的执行等方面，因此，它具有综合性强的特点。同时，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也是大学改革的综合体现，是大学自身与所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互动的结果和产物。因此，把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比喻为处于“深水区”的“最深处”并不为过。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高校就带有鲜明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烙印，这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高校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体现在大学治理体系方面，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的自主权较小，政府的计划性管理思维仍然大量地存在于对高校的管理之中，如我国目前仍是计划性招生体制，但是就业体系已经基本市场化，于是招生和就业之间经常出现不匹配的矛盾；二是在大学内部，受部门思维和计划思维的影响，各种壁垒现象仍十分严重，如学科、专业、课程、院系、部门等之间都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壁垒，既导致人才培养和高校的知识生产无法在开放灵活的环境中进行，也严重地影响大学治理能力，致使大学的管理水平无法得到根本提升。众所周知，现代大学制度是在西方社会背景和环境中的发展起来的，带有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鲜明烙印，因此，在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的建立中，既要吸收西方大学发展中的有益经验，更要凸显中国特色，探索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之下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我国大学制度进行综合的、深入的、系统的改革。

（四）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一个“深水区”

高等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一个处于枢纽地位的“深水区”。因为评价既是我国所持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又是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挥棒。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在2020年10月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可见，国家对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视程度。

高等教育评价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出现的，当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当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走到高等教育系统中来的时候，高等教育评价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高校评价紧紧围绕人才培养展开，但是随着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风气的盛行，高等教育评价的导向也发生了变化，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项目化、指标化、碎片化等现象。在种类繁多的评审面前，学校被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高校的办学特色逐渐被一些量化的指标所替代。既然高等教育评价体现着社会对高等教育所持的价值观，那么，要建立科学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首先就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在此基础上，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高等教育向健康方向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各种“深水区”现象，既与社会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相关，也与特定发展阶段形成的某些惯性密不可分。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有偿服务和“创收”导致大学内部院

系分化，院系组织纷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体。直到今天，许多院系还有“创收”指标。正是院系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体，成为跨院系教育、科研合作的障碍。国家加大投入后，大学创收压力缓解，但院系作为相对独立经济利益体的格局没有改变，部分大学实行二级财务制度，又从制度上强化了这种导向。没有有效的制度创新，很难克服跨院系教育科研合作的障碍。基于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深水区”现象还有一些，暂不赘述。

三、大学转型发展是闯过“深水区”的必由之路

高等教育“深水区”与大学转型发展看似两个不同的命题，其实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转型发展首先是面对“深水区”的准备过程，也是闯过“深水区”的必由之路。在西方高等教育历史进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比喻。西方曾用“冰河期”来形容17世纪前后长达百余年高等教育改革停滞不前的困境。从“冰河期”到“深水区”，虽然东西方比喻的着眼点不同，但确是异曲同工，都代表着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阶段性困境，出现了彷徨的“茫然期”。西方高等教育的“冰河期”长达百年，而最终渡过“冰河期”，究竟是“冰河”的自然“解封”还是大学的主动“破冰”之举，有待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但有一个显见的事实：西方闯过“冰河期”的主要做法是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德国的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英国建立的一批“红砖大学”等。而今天我国面对“深水区”，显然不能等“深水”自然退去，也不能以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为抓手，只能通过现有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型发展，才能够闯过“深水区”。

教育必须转型。这是近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期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报告提出的要求：“教育将我们与世界彼此联系起来，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增强了我们对话和行动的能力，但要塑造真正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教育本身必须转型。”

对当下高等教育而言，其转型发展就是明确未来的大学“应该继续做什么、应该抛弃什么、需要创新什么”。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给出答案，但正如报告所提出：“其发布与其说是勾勒出一个蓝图，不如说是给全世界发送了一封鼓励思考和想象的邀请函。”这也表明，转型发展将是各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

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水区”，大学转型发展应该是一个最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最优解”，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涉及政府与高校双重主体，不仅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的一种清理重整，也是内部关系的一种升级改造。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既是一个理论上的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是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诚如“我们要特别警惕‘身子’进入普及化，‘脑子’还在大众化，习惯还在精英化的问题”。但从实践层面可以发现，“深水区”所涉及之问题，往往具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特点。因为我们熟悉的東西都被“深水”所淹没，故而既摸不着石头过河，也站不到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大学转型发展也可以说是一个“深水区”问题。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

都有各自的特殊问题，适应现实和未来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根本要求。但面对的时代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在历史上，可以通过修修补补就可以解决“适应”的问题，但今天仅仅依靠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需要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都有转型发展的紧迫感。

在新时代，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闯过“深水区”的阶段，但时代给今天的大学转型发展提供了机遇。如我们利用教育技术渡过了疫情影响难关，同时也倒逼了高校进行了一系列教学变革。再如新时代教育评价方案带来的高等教育评价转型和“十四五”规划对于高等教育未来路径的指导。

大学转型发展是闯过“深水区”的唯一路径。进入 21 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和大学开始以各种方式讨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问题。2005 年左右，包括现在哈佛大学 Bacow 校长在内的 20 多位校长、教务长齐聚一堂商讨大学转型，并相继出台了以转型为目标的系列改革，包括消除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现象、突破局限于专业的碎片化教学模式等。当然，即使在西方也有人质疑高等教育是否需要转型，如果需要，是否有能力转型。正是基于各国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认识逐渐达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教育必须转型，尤其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教育技术，已经为高等教育改革或者说转型提供了更加切实、宽广的思路。

大学转型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治理转型、学科转型、专业

转型、评价转型、教师转型等。以目前一流学科建设为例，一些做法还是停留在“为了学科而学科”的思维模式。从本质上讲，大学的学科建设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促进学科自身发展，其二是促进学科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反哺”。如果只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失去了大学进行学科建设的意义。尤其是当我们对学科的生成路径逐步有了科学的认识，即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超学科，把这种认识转化到人才培养过程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时至今日，明明都知道学科建设中跨学科的重要性，但在人才培养领域，管理部门的分割使得“跨学科”无法“突围”。再如目前高校对教师进行考核普遍推行的“工分制”，明明都知道此种办法是最原始的考核手段，且与高校的学术文化相悖，但该做法在许多高校很有市场。最后以大学生毕业率为例，从上到下都知道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宽进严出”的时代，没有“严出”就无法实现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可是学生流动的“立交桥”始终没有搭建起来。

所有高等教育的“深水区”和大学转型发展难以深入的背后，都有一个文化羁绊，即大学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各种惯性，如大学定位的惯性、大学组织的惯性、大学管理的惯性、大学评价的惯性以及已经形成的各种“利益格局”，都是影响高等教育闯过“深水区”的文化障碍。因此，解决我国大学的转型发展和闯过“深水区”，需要从文化视角入手，重新审视大学转型发展的文化羁绊。

（《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12期，作者：邬大光）

以先进的质量保障理念促进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

——新一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内涵解析

新一轮审核评估即将拉开帷幕。这轮评估在进入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高等教育迈向教育现代化、实现强国战略和由“大”向“强”转变历史背景下进行。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发挥评估的诊断、激励、导向作用，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是时代赋予新一轮审核评估的重要使命。用“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质量保障三大理念促进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是新一轮审核评估的重要特点。

一、坚持学生中心理念，促质量主体功能改革

学生中心是指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紧紧围绕学生发展这个中心，把学生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形成有赖于多元主体，其最主要的是学校、老师和学生这三个主体，质量主体功能主要体现在学校抓什么、怎么抓、抓得怎么样，老师教什么、怎么教、教得怎么样和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得怎么样。改革质量主体功能，就是要遵循学生中心理念，全面推进学校“抓”、老师“教”和学生“学”的改革。

1. 改革体制机制，强化学校质量主体功能

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审核“学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情况”（引号内为第一/二类审核评估二级指标原文，下同）；促进学校各级党组织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重点审核“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的情况”；促进学校始终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四个服务”即“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学校党委会、常委会要把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纳入重要议题研究部署。

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重点审核学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和‘三全育人’工作格局建立情况”；促进学校各级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明确、落实到位。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动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局。重点审核学校“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思政课程建设情况，按要求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课程情况”；促进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指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着力加强课程思

政和专业思政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师培育、选拔、使用等各环节各方面做好做实。切实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的《关于印发〈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的通知》精神，全面推进、集中讲授，面向全体大学生，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高校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促进高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作为必修课，面向教育学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和全体师范生开设；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好“形势与政策”课，把《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作为必修教材，深入讲解、系统掌握。重点审核学校“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举措与实施成效，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以及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的建设及选树情况”；促进高校根据专业教育的特点，科学合理确定思政教育内容，在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的示范课以及具有显著育人效果的精品专业课，建设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选树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形成专业课与思政课教学密切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重点审核“学校对教师、学生出现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等负面问题能否及时发现和妥当处置情况”；促进学校建立对教师、学生出现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等负面问题能否及时发现和妥当处置的机制及相关规定，该机制运行有效，该规定执行严格。

三是坚持“以本为本”，强化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重点审核学校“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情况，党委重视、校长主抓、院长落实一流本科教育的举措与实施成效”；促进学校坚持“以

本为本”，推动“四个回归”，夯实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的基础地位以及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学校党委会、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定期研究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出台有效实施措施，做到“八个首先”即“领导注意力首先在本科聚焦，教师精力首先在本科集中，学校资源首先在本科配置，教学条件首先在本科使用，教学方法和激励机制首先在本科创新，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量首先在本科显现，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首先在本科实践，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在本科确立”。重点审核学校“在教师引进、职称评聘、绩效考核等制度设计中突出本科教育的具体举措与实施成效”；促进学校强化教师引进、职称评聘、绩效考核突出本科教学的制度设计。教师引进中，以本科教学需要为第一需要，注重师德师风和教学能力考核；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绩效考核中，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同等对待，对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予以倾斜，确保教师投入教学工作的积极性。

四是改革育人机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重点审核“学生理想信念和品德修养”；促进学校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品德修养的培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学生理想信念坚定，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热爱集体、关心社会”。重点审核学校“加强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学生爱国、励志、求真、力行情况”；促进学校采取

有效措施加强学风建设，形成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机制、环境和氛围，引导学生为国家发展，为追求真理而勤奋学习、奋发图强。深入学习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要求，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重点审核“学生基础理论、知识面和创新能力 / 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和独立解决生产、管理、服务中实际问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学校重视学生的知识学习和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学习成效显著。学术型人才培养的学生，要基础理论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生，要具有较强的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独立解决生产、管理和服务中实际问题的能力。重点审核学校“开展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措施与成效”；促进学校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采取切实有效举措，深化体育、美育教学改革，加强劳动教育，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重点审核学校“社团活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开展情况及育人效果”；促进学校积极支持各种类型健康向上的学生社团和俱乐部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注重建设美丽的校园环境和浓郁的校园文化，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感染、熏陶和激励；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参加志愿服务，有效增强学生的表达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实践操作能力等。重点审核“学校开展学生指导服务工作（学业、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心理健康咨询等）情

况，学业导师、心理辅导教师、校医等配备及师生交流活动专门场所建设情况”；促进学校建立完善的学生指导服务体系，配备专门教师，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条件，开展学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就业指导 and 大学生健康心理咨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确保不因贫困而辍学等，帮助学生成长成才。学业导师、心理辅导教师、校医等配备及师生交流活动专门场所建设满足要求。

2. 改革教学模式，强化教师和质量主体的功能

质量主体与教学主体含义不同，就质量而言，教师和学生都是重要主体；就教学而言，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教学的基本问题是教什么（内容）、怎么教（方法）和教得怎么样（评价），以及学什么、怎么学和学得怎么样。如果教学设计主要取决于教什么、教学过程主要取决于怎么教、教学评价主要取决于教得怎么样，这是以教为中心的教学；如果教学设计主要取决于学什么、教学过程主要取决于怎么学、教学评价主要取决于学得怎么样，这是以学为中心的教学。

一是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推进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改革。重点审核学校“实施‘以学为中心、以教为主导’的课堂教学、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学评价情况”；促进学校转变教育教学理念，积极推动课程教学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促进教与学、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科学设计课程考核内容与方式，推进教学内容及考试评价方法改革。

二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带动教育现代化。重点审核学校“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融合、加强数字化教学环境与资源

建设情况”；促进学校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的融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在教学和管理中的应用，探索实施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教育，推动形成‘互联网+高等教育’新形态”。改革传统教与学形态，因课制宜实施多元化课堂教学，推广小班化、探究式、混合式教学，提倡采用翻转课堂，实施线上线下结合教学新模式；大力推进数字化教材建设，网络资源和学科与科研资源等辅助教学资源等建设；以学生为中心，以课堂教学改革推动学习革命，“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激发求知欲望，提高学习效率，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二、坚持产出导向理念，促质量要素配置改革

产出导向指教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所取得的学习成果。需要解决好五个问题：想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么？为什么要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如何有效帮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如何知道学生已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如何保障学生能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五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五个度”，即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质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和学生和用户的满意度。五个度又取决于过程性要素和资源性要素等质量要素的配置。要大力推进质量要素配置改革与建设，使其能有效促进“五个度”的提升，成功解决上述五个问题，全面达成学生的学习成果目标。

1. 改革过程性要素配置，以卓越教育教学过程产出卓越质量

一是响应时代要求，推进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重点审核学校“实

施‘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2.0、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以及一流专业‘双万计划’、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建设等举措及实施成效，围绕‘培育高水平教学成果’开展教研教改项目建设的举措及实施成效”；促进学校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培养卓越人才。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通过提升教师能力、改革教学方法、科学评价学生学习、严格制度管理、强化激励机制。大力推进教学研究与改革，围绕“培育高水平教学成果”开展教研教改项目建设。重点学校“优秀教材建设举措及成效”；促进学校制定教材建设规划，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编写和选用优秀教材。

二是大力推进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重点审核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体系与创新创以先进的质量保障理念促进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业教育平台建设情况”；促进学校把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突破口，强化顶层设计，整合学校各方资源，多部门协作，建立有效运行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体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加大各级科研基地向本科生开放力度，在大学生创新创业与社会需求之间搭建对接平台。重点审核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融于专业教育的举措与成效”；促进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面向全体、分类施教、结合专业、强化实践，让“学生尽早参与和融入科研，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提高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推动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深化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训练、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改革，强化创新创业导师培训”，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

2. 改革资源性要素配置，以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支撑卓越教育教学过程

一是建设师德高尚、教学能力强、肯投入的师资队伍，做好学生的引路人。重点审核学校“保障把教师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强化师德教育、加强师德宣传、严格考核管理、加强制度建设，落实师德考核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等方面的情况”；促进学校把教师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完善师德考核制度，将师德师风建设要求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建立完备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和有效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注重高位引领与底线要求结合，不断激发教师内生动力。重点审核“教师在争做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自觉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方面的情况”；促进广大教师具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自觉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标准》，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自觉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重点审核“专任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能力、科研水平和能力 / 专任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能力、产学研用能力”；促进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能够很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做到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对

于学术型人才培养，教师要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将科研融入教学，指导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在科研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师应具有产学研用能力，能够结合生产实际，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重点审核学校“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和水平的措施”；促进学校因校制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的培训，“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基层教学组织，广泛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全面提高教师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重点审核“教师投入教学、教授全员为本科生授课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情况及实施效果”；促进学校把教学工作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从制度上保证教师必须自觉履行教师育人的基本职责，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工作。建立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制度，特别是引导教授为本科一年级学生上课，并认真落实。重点审核“教师特别是教授副教授开展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与建设情况及成效”；促进学校建立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教师教学奖励制度，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参加教学改革、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

二是建设丰富多彩的现代化高水平教学资源，提升教学水平。重点审核学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及其共享情况 / 行业企业课程资源库、真实项目案例库建设及共享情况”；促进学校加强课程资源建设，建成一批优秀课程资源，形成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内容丰富的高水平辅助教学资源。对于学术型人才培养，着力“推动优质课程资源开发建设和开放共享，促进慕课等优质资源平台发展，鼓励教师多模式应

用，鼓励学生多形式学习，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形成支持学习者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泛在化学习新环境”；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结合行业企业实际，建立健全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加强课程资源库、真实项目案例库建设力度，推动把行业企业的优质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重点审核学校“面向国家、行业领域需求的高水平教材建设举措与成效 / 面向行业企业实际、产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教材建设情况”；促进学校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教材研究和高水平教材建设。对于学术型人才培养，学校要鼓励支持专业领域造诣高、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学者编写教材，面向国家、行业领域需求，编写高水平教材，创新教材呈现方式和话语体系；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学校要组织教师面向行业企业实际，结合产业发展需要编写教材，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点审核学校“适应‘互联网+’课程教学需要的智慧教室、智能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和条件建设及使用效果”；促进学校积极打造智慧学习环境，借助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智能技术，建设适应“互联网+”课程教学需要的智慧教室、智能实验室建设，有效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开放式学习和泛在学习。重点审核学校“学科资源、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情况 / 产业技术发展成果、产学研合作项目转化为教学资源情况”；促进学校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拓和有效利用各类教学资源。对于学术型人才培养，要着力促进学科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转化为实验项目；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着力将产业技术发展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将产学研合作项目转化为实验项目。

三、坚持持续改进理念，促质量保障方式改革

持续改进机制是质量保障“评价—反馈—改进”得以闭环运行的前提。就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趋势而言，从科层机制走向文化机制是其必然。外部质量保障的重点是，如何发挥“文化”保障“质量”作用，提升高校自我质量保障能力。我国高校内部质量体系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尽管许多高校都已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自我评估等机制，但总体看，持续改进理念与持续改进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质量保障工作主要停留在经验层面和制度层面。要大力推进质量保障方式改革，形成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将质量价值观与质量要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行为自觉。

一是树立先进的质量保障理念，为质量保障工作提供有效指导。重点审核学校的“质量保障理念及其先进性”；促进学校建立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先进的质量保障理念，将其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不断提高质量保障能力的根本观念和执着追求。重点审核学校“质量保障理念在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与运行以及质量文化形成中的作用”；促进学校以先进的质量保障理念为指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体现学校是质量保障的主体，保证人才培养目标与时代发展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质量与人才培养目标相符合；质量保障体系有效运行，不断“激发学校追求卓越，将建设质量文化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

二是完善质量标准，发挥标准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审

核学校“依据国家相关标准，符合国家、社会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需求的一流质量标准建设情况”；促进学校用标准加强引导、加强监管、加强问责。要把“国标”用起来、落下去。依据国家标准建立学校质量标准，学校质量标准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及有关行业标准；质量标准满足社会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需求。重点审核学校“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落实情况”；促进学校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人才培养要求，构建各教学环节，包括课堂教学、实习、实验、毕业设计等的质量标准，把质量标准作为质量监控、质量评价的依据，确保严格执行。

三是健全质量保障机制，增强质量保障效果。重点审核学校“质量监控部门及其职责，质量监控队伍的数量、结构和人员素质情况”；促进学校建立完善的质量保障机制，设置能独立行使监控职责的质量监控部门，明确职责任务，建立一支高水平、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质量监控队伍，对日常教学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重点审核学校“自我评价机制、评价结果反馈机制、质量改进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情况”；促进学校建立内部质量自我评价制度，健全以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学院本科教学评价、专业评价、课程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为主体的全链条多维度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针对评价反映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反馈，制定纠正与改进方案和措施，配备必要的资源，进行质量改进，对纠正与改进措施的有效性适时进行评价。学校建立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并持续运行，质量改进取得明显成效。

四是营造浓郁的质量文化，提升质量保障水平。重点审核学校“自

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建设情况”；促进学校将思想、制度、行为、物态等不同层次质量文化统一起来，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氛围，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校园育人文化，把质量意识内化为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将其作为推动学校不断前行、不断超越的内生动力。重点审核学校“将质量价值观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将质量要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行为的情况”；促进学校树立质量第一先进的质量保障理念促进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一的意识，把人才培养质量看作学校的生命线，将质量意识、质量标准、质量评价、质量管理等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逐步深入内心，内化成为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新一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突出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质量保障“三大的理念”。要正确把握指标体系内涵，大力推进以质量主体功能、质量要素配置和质量保障方式改革为重点的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从而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作者：李志义）

◆ 建设实践

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逐年提高背后 ——考研热度攀升，折射就业市场新变化

近日，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陆续展开，围绕它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分数线再次提高，令不少考生大呼考研越来越“卷”，甚至被人称为“小高考”。考研为什么越来越难？在竞争激烈和分数升高的表象下，研究生考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又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和特点？

1. “不就业也要考研”，执着背后的深层考量

东北某高校本科应届毕业生小刘报考一所名校软件学院的硕士生，没有过分数线，但是小刘并没有沮丧很久，目前他正在完成毕业设计，暂时没有找工作的计划，打算“二战”考研。小刘并不是个例，“二战”甚至“三战”已经成为考研学生群体的常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学生考研的初衷是增加就业竞争力。但奇怪的是，一些备考学生哪怕有好的工作机会也不急于就业，动辄“二战”。

“相当一部分‘二战’现象出现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身上，他们没有解决温饱的压力。执着于考研背后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因为一些学生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缺少职业规划。”内蒙古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李玉珍说。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黄磊说：“从考研动机来看，确实有很多同学是热爱专业，想进一步深造，未来从事科研工

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考研目标并不明确，并没有做好进入职场的充分准备，想通过考研暂缓就业。”

“以 2022 届毕业生为例，他们是 00 后，多为独生子女，家庭环境较好。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对究竟该选择就业还是考研、考公务员并没有明确概念，而他们的家长大多并不期待孩子尽早就业，更希望孩子能有一个高学历为未来作保障，所以非常支持学生考研。”黄磊说。

黄磊发现，就业压力和考研压力叠加，缓就业的想法推高了考研难度，却并不能让未来就业难度降低。因此，黄磊提醒：“如果仅仅是为了逃避工作压力而选择考研，那么一定要仔细慎重考虑。研究生毕业之后，并不一定能够找到比目前更适合的工作。而且考研‘二战’如果失败，付出的成本会非常高。反过来，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工作，带着几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再考研，可能会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2.从追求“更好的自己”到追求“上岸”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曾经有一段时间，考研学生中普遍存在“名校情结”，许多本科非“名校”的学生渴望圆自己的名校梦，刻苦备战考名校。近几年，一些学生不再追求名校，而是追求“上岸”——通过任意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双一流”院校的报考人数增速在放缓，而普通院校的报考人数大幅度增长。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从就业角度看，从普通学校本科到普通学校研究生，竞争力差别如此之大吗？

“无论是从就业角度还是育人角度来看，读研的性价比还是比较

高的。一是社会形势，对学生吸引力强的大型企业很多明确要求硕士学历，绝大多数能够提供北京等大城市户口的单位也都要求研究生学历。二是发展空间，本科学历毕业生就业后的‘天花板’高度有限，在岗位晋升和薪资待遇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三是就业难度，研究生找工作相对容易，以我校为例，2022届研究生年前就业率已经达到90%了，剩下10%也基本是手里有录用通知在寻找更好的单位。”黄磊说。

“我这几年毕业的研究生中，有好几个本科也在我们学院就读，读了硕士后就业待遇都很好。毕业后同样是去县城中学教书，研究生都按人才引进，要么给房子，要么给安家费。本科毕业的话，去县城中学得参加教师招考，竞争很激烈，就算考上也没特殊待遇。”李玉珍说。

社会需求是就业的指挥棒。当优质就业岗位都要求硕士学历的时候，考研就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而同时，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考研，也意味着优质岗位有足够的研究生可供挑选，那么要求标准也会不断提高，形成一个不断上升的“考研和就业螺旋”。

这样的情况下，为争取一个普通工作机会，很多人选择了更现实的硕士学历，而非较难考取的名校硕士学历。

“社会的发展缩小了大中小城市间的差距，很多学生不再倾向于去大城市漂泊闯荡，而是更追求稳定舒适的工作和生活。如果不在大城市就业的话，就未必一定要冒险竞争名校。”李玉珍说。

3.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学生之间的“双向奔赴”

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优化

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稳步扩大，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也提出：“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

政策导向上，专硕（专业学位研究生，通常简称为“专硕”，学术学位研究生简称“学硕”）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现实中来看，相比学术型硕士，专硕也更受学生欢迎。

“学硕是为了培养科研人才，学生毕业后往往还会继续深造读博；而相当一部分学生考研是为了增加就业竞争力。专硕既满足了这些人的考研需求，又能两年拿到学位，工作时也更容易上手。”李玉珍说。

扩大专硕招生规模和学生愿意报考二者“双向奔赴”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变化。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景叶说：“专硕教育以培养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为目标，培养学生的工程技术创新创造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难题的能力，对于国家产业链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年发展，国家初步构建了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已经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可，考生在选择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报考时也更加理性务实，不再盲目追求学术学位。”

李景叶认为，未来专业学位研究生“含金量”将进一步上升。“招生规模扩大，国家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

产学研深度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报考人数、培养质量、社会认同度将进一步提高。”

4. 未来几年，考研热或将持续升温

“受多重因素影响，未来几年，考研人数仍然会持续增长，考研的难度和调剂的难度都将持续攀升，建议考生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报考，切勿盲目追求热门专业。”李景叶说。

追求“上岸”导致很多学生考研追求“好考”，从而出现了类似公务员考试中的情况，条件要求越少的专业报考人数越多，反而变得“不好考”了。

李景叶说：“近几年，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不少考生盲目追求热门专业或初试门槛相对较低的专业，使得部分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学位的报考人数激增，报录比居高不下。例如全日制的会计专业学位，从报考情况来看，全国大部分招生单位的第一志愿生源十分充足，考生一旦不能被第一志愿招生单位录取，基本不存在调剂的机会。”

此外，有调查显示，部分高校专硕停招全日制学生，转为非全日制，是 2022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李景叶认为，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完善，非全日制硕士在就业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措施正在逐步落地。教育部在《关于做好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作为限制性条件。因此，非全日制研究生将会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更大认可。

（《光明日报》2022 年 4 月 12 日 作者：李玉兰）